

日本漢學研究的歷史背景概述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Sinology Research

賴振南 (Lai Chen-Nan) *

21-32

一、前言——日本漢學研究的現況

日本自近代以後，指稱研究中國的學問就有「漢學」、「支那學」、「中國研究」、「中國學」、「東洋學」等5種或5種以上的日文名稱。平常這些學問名稱並非指完全不一樣的內容，而且一直以來在認知與理解上也並沒有被視為不同。一般而言，這些學問不僅在認知與理解上有被當成同樣內容的一面，於專家、學者之間也會因時、因人有重疊的情形，其重疊部分也有大有小。但是這樣的區分，也會在該領域的學者、專家間因著時代、觀點或方法等方面，時而微妙、時而極其尖銳地反映出差異來。這樣的現象反映出，日本的漢學研究發展到今日，不論個人或團體，尤其在文史哲這三大領域上，已達小而美、大而廣、錯綜複雜、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書籍汗牛充棟、學者人才輩出的階段，僅就日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漢學研究機構與漢語教學的大學數量，便可窺出其端倪。

日本漢學研究的重鎮分屬日本兩所最著名的大學：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於20世紀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自成立到現在都對日本的漢學研究發揮著重大影響。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於1941年11月根據天皇的命令成立，專門研究中國重要地誌、社會民俗等，1948年4月，該所進行戰後改組，原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學院併入其中，建立了以學科分研究部門的體制，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漢籍17.7萬餘冊，有相當數

量的珍本、善本典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於1939年，是當時的日本政府為適應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一個人文科學的綜合性研究機構，1948年在美國占領軍督促下進行改組，原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併入，遂形成了現在的規模。該所收藏的中國珍本、善本典籍和珍貴文物極為豐富，僅甲骨文片就達3,600餘件，中國龍門、雲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數量之大，實在驚人。

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屬國家級研究單位。日本民間的漢學研究團體亦很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文庫及其研究委員會，東洋文庫創建於1924年，是一個把中國與中國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門性圖書館兼研究所。東洋文庫的原所有者是北洋軍閥的英國顧問莫里遜 (George Ernest Morrison)，此人在1897至1917年的20年間，在中國收集圖書文獻2,400餘冊，地圖畫卷1,000餘份。1917年8月，日本三菱財閥岩崎久彌購得這批珍貴文物，岩崎久彌以這批文獻為基礎加以擴展，1924年11月正式建立東洋文庫，並建立了研究系統——研究委員會。最早的負責人是日本著名學者白鳥庫吉，以研究中國為主。戰後50年代，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撥款給東洋文庫，建立了「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目前東洋文庫的研究系統有5個部12個研究委員會，第一部就是中國研究部，包括東亞考古委員會、古代史研究委員會、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宋史研究委員會、明史研究委員會、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第三部是東北亞研究部，包括滿洲研究委員會，朝鮮研究委員會。把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

* 作者現為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總務長。

從中國分割出去，這是戰前日本「滿洲學」反動觀點的繼續。

此外，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團體還有：1946 年鹿地互、三島一、野原四郎等創建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安藤彥太郎、平野義太郎、伊藤武雄等創建的「中國研究所」；1947 年「東方學會」創立；1949 年「日中友好協會」成立，出版《日本與中國》雜誌，岩材三千夫為主編；同年「日本中國學會」成立，出版《日本中國學會報》；1950 年「大陸問題研究所」成立，出版《大陸雜誌》；1951 年「甲骨學會」在東京成立，出版《甲骨學》雜誌；同年「中國文藝研究所」成立，出版《中國文藝》；1953 年「魯迅研究會」成立，出版《魯迅研究》；1955 年日本「全國大學漢文教育研究會」成立；1956 年「日本中國文化交流會」成立，中島建藏任理事長。

日本專門收藏漢文書籍的文庫和藏書館收藏了大量善本、珍本漢籍，為全世界的漢學家所重視。主要的文庫和藏書館有：1. 宮內廳書陵部，這是日本皇家的御藏圖書，多有善本；2. 「內閣文庫」，這是日本的國家圖書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所、足利學校圖書館，收有多種善本；3. 金澤文庫、尊經閣文庫、米澤圖書館，這是日本東北地區有名的善本書藏書處，藏有宋版的《史記》、《漢書》、《後漢書》及《莊子》、《列子》的宋人注釋本等；4. 大倉文庫、天理圖書館，是天理教設立的圖書館，收有大量的通俗小說；5. 斯道文庫，現歸東京慶應義塾大學，1938 年由麻生產業會社社長麻生太賀吉創立，在九州的福岡市，收有大量的中國古籍；6. 清柳文庫，是江戶後期以青柳文藏（字茂明）命名的文庫，所收書籍多為荻生徂徠派的著作，藏書現多屬宮城縣圖書館等等。主要的大學圖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包括總館和各文科學部藏書；京都大學圖書館，包括總館、人文科學研究所、文學部藏書；此外，東北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大阪大學、廣島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大東文化大學、二松學舍、大谷大學、龍谷大學等大學圖書館也都收有漢文書籍。

日本開設中國文史哲課程和中國語課程的大學很多，據 1978 年出版的《日本全國大學職員錄》記載，1977 年日本全國 430 餘所國立公立和私立大學中，從事中國文史哲等方面教學的講師以上的研究家共計 1,322

人，分別開設將近 2,500 門中國問題研究課程。這當然是一個很不完全的數字，因為除了在校的教員之外，在各大學尚有一批著名的名譽教授，以及未獲名譽教授之稱而退休的學者並未統計在內，如果再加上數量眾多的各短期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各有關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專任研究員，估計這一支研究隊伍約在 3,000 至 3,500 人左右。日本學術界有關人士認為，其中具影響力的專家約在千人左右。這是截至 1977 年為止的情況，1977 年以後，日本的中國文史哲和中國語教學又有了長足的發展，據概略的統計，截至 1998 年日本開設這些課程的主要國、公立大學有：東北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 26 所大學。開設這些課程的主要私立大學有：上智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等 30 所大學。日本漢學研究之所以會如此興盛，研究與教學機構之所以會如此普設，是有它的歷史脈絡可循的。

二、日本接觸與模仿中國漢詩文的開端

日本向來以「漢」泛稱中國，例如稱中國字為「漢字」或「漢語」；稱中國詩詞為「漢詩」；稱中國的書籍、文章為「漢籍」、「漢文」；稱中藥為「漢方藥」等等，可見稱學習或研究中國的學問也可稱為「漢學」了。事實上漢學自久遠以前業已傳入日本，現今雖一概以漢學稱之，卻包含有儒教、道教、兵學、法學以及其他諸般學問。佛教起源於印度，後經中國、朝鮮傳到日本，因為其教義、經典等內容是被翻譯成漢文，所以從文章型態觀之，還是不出漢學的範圍。而且，自應神天皇（270-310 年）以後漢文漢學逐漸被採用，開始國家的歷史紀錄，在法制、政治、教育或經濟等等的文化活動上，雖多少有程度的不同，但無一不受漢學的影響。根據日本《古事記》的記載，漢學最早是於應神天皇十六年（284 年）由朝鮮百濟國博士王仁攜帶《論語》10 卷和《千字文》1 卷間接東傳進日本的，而直接從中國傳入漢學，是於六世紀後半期的推古天皇時期（562-628 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 年），當時攝政的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國隋朝，第二年小野妹子陪同隋使文林郎裴世清等 13 人回日本，裴世清等人同年回國時，日本朝廷又派小野妹子同往，這次跟隨出訪中國的還有留學生、學問僧等十餘人，人數雖不多，

但其中有人留學時間竟長達二、三十年。這些人回國後，對傳播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作用，此後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和學問僧，於是漢學書籍便大批大批地被帶進日本，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根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田中隆昭教授的考證，¹日本自欽明二年（630年）派出的第一次遣唐使後，總共陸陸續續派遣過15次遣唐使（第15次為838年），前後相距約二百年，另外還有派往朝鮮的渤海使共34次（自729年至919年），間接自朝鮮半島進口的漢學書籍更是不計其數。在平安時代寬平年間（889-897年），當時的陸奧守藤原佐世奉敕編成《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就記錄有漢籍《易》、《尚書》、《詩》、孔、農、小說、兵家等40類1,579部16,790卷書目在日本。

日本自奈良時代（710-794年），貴族知識分子將唐代文學大量引進日本，日本的散文和韻文都受到了漢文學的影響。散文如《日本書紀》乃模仿荀悅的《漢記》，《日本書紀》關於天地開闢的敘述，幾乎是《淮南子·天文訓》的翻版。韻文中的《懷風藻》受六朝到

唐初的駢儷文影響很深，就算著名的《萬葉集》在形式上也是模仿中國的古詩，《萬葉集》中的長歌、短歌和旋頭歌，其音節組成，都以五、七為主，這實際上是仿照中國的五言詩和七言詩。自《萬葉集》之後，這種以五、七音節的日本詩，便成為日本詩歌（通稱「和歌」與中國的「漢詩」作區別）的傳統音節型態。

三、平安時代——日本盛行漢詩創作

自平安時代（794-1192年）以來，日本詩壇漢風大盛，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時編撰的漢詩集《凌雲集》（亦稱《凌雲新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較之奈良時代的《懷風藻》內容豐富得多，藝術表現力也有所提高。僧侶空海的漢詩集《性靈集》風雅典麗，較之上述之《凌雲集》等又更勝一籌，空海編撰的論述漢詩創作方法的著作《文鏡秘府論》，旁徵博引，彙集了許多唐人詩論，成為當時日本人學習漢詩的導引工具，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此時期的著名史書和漢詩文集大致如下表：

一、官撰漢文正史	
續日本紀	第二部日本正史，40卷，編年體。藤原繼繩、菅野真道等13人纂修十八年，於797年完成。
日本後紀	第三部日本正史，40卷，編年體。藤原東嗣、藤原緒嗣等15人纂修二十二年，於840年完成。
續日本後紀	第四部編年體正史，20卷。藤原良房等6人纂修十五年，於869年完成。
日本文德天皇實錄	第五部編年體正史，10卷。藤原基經、菅原是善、都良香等7人經九年於879年完成。
日本三代實錄	第六部編年體正史，50卷。藤原時平、菅原道真等5人，經十年於901年完成。
二、私撰漢文正史	
類聚國史	菅原道真編，892年完成。
日本紀略	撰者不詳，11世紀後半至12世紀初成立。亦稱《日本史記略》、《日本史略》、《日本史類》。
本朝世紀	藤原通憲編撰，1150-1159年成立，全20卷。
扶桑略紀	叡山高僧皇圓著，皇圓1169年歿前成立。
三、敕選漢詩文	
凌雲新集	第一部敕撰漢詩集，1卷。小野岑守等人慎選782年至814年的漢詩91首編纂而成。書名取自中國六朝梁江淹〈別賦〉的「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意。」及唐玄宗宴兩相及禮官學士詩序的「同湛露之篇，宜振凌雲之藻。」意指《凌雲新集》為優秀的漢詩集。

¹ 田中隆昭，〈渤海使與日本古代文學——以《宇津保物語》和《源氏物語》為中心〉，田中隆昭監修《渤海使與日本古代文學·亞細亞遊學別冊2》（東京：勉誠出版，2003年10月）。

文華秀麗集	第二部敕撰漢詩集，3卷，今僅存1卷，於《凌雲新集》編纂後四年的818年，大納言藤原冬嗣奉嵯峨天皇敕命，與仲雄王、菅原清公等人共同編撰而成。
經國集	《文華秀麗集》之後九年的827年，中納言良岑安世奉淳和天皇敕命，與滋野貞主等人編纂的第三部敕撰漢詩集，原20卷、今存6卷。《經國集》書名取自魏文帝「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接近《文選》的綜合性詩文集。
四、其他主要漢詩文	
文鏡秘府論	日本最初的漢詩文研究評論書。入唐學僧弘法大師空海編著，約成立於819年。對後來日本的歌學與歌論有很大的影響。
性靈集	正式名稱為《遍照發揮性靈集》，10卷，空海的詩文集，約成立於827年。
都氏家集	都良香的漢詩文集，於879-880年由弟子們類聚編成。
田氏家集	平安初期代表詩人之一的島田忠臣的個人詩集，成立於891年。

因為日本平安時代所傳承的主要是中國自六朝至唐初的漢學，所以很遺憾尚未達到思想上的研究。只著重於編撰歷史與漢詩文的模仿及創作，至於諸經書的義理研究方面尚未能及。

四、五山時代——中國禪宗和宋學廣泛傳入日本的重要時代

平安朝之後，日本有一特殊時代名叫五山時代，是中國禪宗和宋學廣泛傳入日本的重要時代。五山時代是一個文化史的概念，時間自西元13世紀至16世紀，歷時約400年，此時代與奈良、平安時代以都城所在地命名不同，是模仿中國南宋佛教禪宗的基地五山而來的。

日本自中世（1192-1603年）的鎌倉時代（1192-1333年）起，日本佛教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由貴族公卿把持寺院以研究經典和祈禱法會為主的所謂「貴族佛教」逐漸瓦解，反映武士階層精神的禪宗興盛起來，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不必研讀佛教經典，主張見性成佛和頓悟，在武士階層中大受歡迎。14世紀中期，禪宗勢力打進京畿地區，便模仿中國「五山」的名法定京都的南禪寺、天龍寺、建仁寺、東福寺、相國寺為「京都五山」；指定鎌倉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等五寺為「鎌倉五山」，這些禪院成為漢詩文等學藝的一大據點，他們的漢詩文作品被稱為「五山文學」。

與平安時代明顯不同的是，五山時代由僧侶階級主宰文化，非但佛教文化，世俗文化也歸於佛門僧侶，一改平安朝貴族知識分子壟斷文化的態勢，與此相關聯的

是，中國文獻典籍東傳的主要傳遞者也由貴族知識分子變成了佛教僧侶，五山時代的日本僧侶以內外典兼通為尚，對中國儒學採取相容並蓄的態度。日本僧侶對中國儒學原本採取排斥的態度，佛與儒本來是對立的，但是後來中國本土禪宗大盛，佛與儒兩家開始交互為用的新局面。禪宗主張的坐禪內觀與宋儒主張的靜坐省察；禪宗的頓悟說與宋儒的豁然貫通說幾乎同出一轍，兩者主張以禁欲主義的手段來淨化本性的修身術也是一樣的，因此禪宗與宋儒漸趨同一。

中國與日本禪僧的交往中，中國的新儒學——宋學進入了日本。中國典籍傳入日本後，由於語言文字的差異，只有具有深厚中國語言文字修養的學者，才能讀懂中國典籍並從事研究。這是漢籍在日本廣泛傳播的巨大障礙。宋學傳入日本後，讀懂漢籍成了日本人更為迫切的要求，於是出現了「漢籍和訓」，成為原著日譯之前克服漢字讀音困難的變通辦法，所謂「漢籍和訓」實際上就是變「漢文直讀」為「漢文譯讀」，即在漢文原著上，按理每一漢字的訓詁意義標注上日本假名，藉此使不懂漢文或漢文程度不高的人也能讀懂原著。「漢籍和訓」對漢文典籍的推廣和普及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日本人研究宋學也得以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

宋學在東傳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問，這不僅僅具體表現在對它的傳播、講習以及和訓，最為重要的是，在五山時代，日本已開始對宋學進行獨立的研究，並且各種研究著作先後問世，這是宋學成為獨立學問的一個重要標誌。宋學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1. 以「語錄」形式到專題論文到宋學研究的專門性著作。宋學研究的專著作者以雲章一慶（1386-1463

年)、清原業忠(1409-1467年)、清原宣賢(1475-1550年)為代表。2. 15世紀,日本逐步形成了宋學學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歧陽方秀(1363-1424年)為代表的京師朱子派;以桂庵玄樹為代表的薩南學派;以南村梅軒為代表的海南學派和以清原業忠、一條兼良為代表的博士公卿派等。日本宋學發展至此,在學術界已蔚為大觀。3. 17世紀初,新建立的江戶幕府終於把它確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中日兩國禪學的頻繁交往,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日本的流布,唐宋詩歌的藝術成就在日本逐漸深入人心,日本僧侶漢詩寫作漸成風氣,終於形成了日本文學史上的五山漢文學。五山漢文學是指日本禪宗僧侶的漢文學欣賞與創作,其中以漢詩創作為主。五山詩風,崇尚中晚唐及宋代詩歌。五山文學代表作家大體可分「本土派」²和「遊學派」³兩類,這兩類作者都有成績斐然可採者。五山時代的漢詩人,透過漢詩創作,廣泛地接受了中國宋代開始的新文化,成了當時中國新儒學傳入日本的主要傳媒者。

五、江戶時代——宋學取代儒學成為官方哲學及國家的意識形態

當日本進入江戶時代(1603-1867年),中國傳入日本的朱子學成了日本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國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就更加廣泛深入了,江戶時代是日本封建社會末期,因當時首都在江戶(今東京),所以稱為江戶時代。江戶時代是儒學傳入日本後發展的高峰期,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受到了德川幕府的推崇,被尊為「官學」,成為日本的統治思想。朱子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在理論層次上影響了這一時代的學術,而且在實踐層面上也成為日本人主導的價值觀。因此,不瞭解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就不能理解儒學和日本文化的關係,也不能理解日本漢學的發展。

有的學者把江戶時代的儒學直接稱為「宋學」,這

是因為以明經訓詁為主的日本舊儒學在15世紀就已經逐漸被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學說為主的新儒學所代替,到了江戶時代,人們所謂的儒學一般已經是指宋學了。中國的宋學,於15世紀中期在日本逐步形成為獨立的學術。以宋學的獨立學術形態為標誌,從此日本漢學作為日本文化發展中一個特殊的學術領域得以誕生,正因為這樣,宋學便是日本漢學最早的內容。17世紀之後,由於在日本統治階段把宋學作為官方哲學,成為長達250餘年的江戶幕府時代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之一,因此,宋學又是日本漢學的主要內容。

不少日本學者認為,將宋學當作一門獨立學術的創始人是江戶時代的藤原惺窩(1561-1619年)。永田廣志(1904-1947年)在《日本哲學思想史》中說:「否定了佛教的優越性,終於還俗專講儒學的藤原惺窩,其獨立的思想流派被看做是日本儒學的創始人,是有充分理由的。儒者這一幫既非僧侶又非神官的特殊思想家,實際上就是在他的門下培養出來的。」⁴儘管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日本儒學形成於14、15世紀,而不是江戶時代,但是,藤原惺窩在京都講學培養了許多優秀門徒,為傳播和研究朱子學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這是不爭的事實,由於藤原惺窩曾為德川家康講學,對德川家康的影響頗大,朱子學成為江戶時代的「官學」,和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日本江戶時代的漢學,⁵除了以藤原惺窩和林羅山為代表的正統朱子學派以外,還有古學派和陽明學派。古學派18世紀最為興盛,其中包括山鹿素行的古學派、伊藤仁齋的古義學派和荻生徂徠的古文詞學派,日本學術界對伊藤仁齋的思想非常推崇,認為他是真正理解孔子和孟子的學者,甚至說他是「日本儒教的創始者」。江戶時代中後期出現的陽明學派,也是一個很大的儒學流派。日本的陽明學產生在社會下層,是民間之學,這個學派的開創者是中江藤樹。

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儘管接受了中國的宋明理學,

2 虎關師鍊(1278-1346年)、夢窗疏石(1275-1351年)、義堂周信(1325-1388年)。

3 雪村友梅(1290-1346年)、中巖圓月(1300-1375年)、絕海中津(1335-1405年)。

4 永田廣志,《日本哲學思想史》(永田廣志選集4,東京:白揚社,1948年,全426頁)。

5 一、朱子學派:藤原惺窩(1561-1619年)、林羅山(1583-1657年);二、古學派:山鹿素行(1622-1685年)、伊藤仁齋(1627-1705年)、荻生徂徠(1666-1728年);三、陽明學派:中江藤樹(1608-1648年)、吉田松明(1830-1859年)。

但與中國本土的儒學還是有所不同，他們很少關注宋明理學中思辨性很強的本體論，也很少進行關於世界觀的抽象思考。他們接受了「理」這一範疇，卻不把它理解為形而上的客觀本體，而僅理解為與經驗事物相聯繫的道德準則，從而成為一種純粹的政治道德學說，因而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與其說是一種學理層面上的研究，不如說是一種與經驗事物直接聯繫的理論。有的學者認為，日本儒學疏於抽象思考的特色，這與日本的抽象思維的形成較晚有關，也與有的學者指出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直觀的或即物主義的性格有關。

江戶時代，湧現了許多漢學家，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擅長漢詩文的文學家。江戶時代前期的漢詩文，就其影響而言，首數藤原惺窩，他的文學觀沿襲宋代理學家的「文以載道」說，主張「道外無文，文外無道」，將文學作為闡發義理的工具，否認文學獨立的藝術價值。《惺窩文集》中的漢詩大多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因為惺窩文名氣大、門徒多，在江戶前期的詩壇，影響還是很大的。

江戶中期，隨著空談理性的風氣逐漸衰頹，注重現實的「經世致用」的論調逐漸佔據上風，在理學壓抑下的漢詩文，也獲得了某種解放，變得道學氣漸減而文學味漸濃，在這方面作出貢獻的，首推荻生徂徠，但徂徠及其追隨者崇拜明代前後七子⁶的復古主義主張，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尤為崇拜後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攀龍和王世貞。李攀龍、王世貞模擬唐宋詩人，他們又模擬李攀龍、王世貞，從此蔚成風氣。一直到山本北山（1753-1812年）登上文壇，有系統地介紹並宣揚袁宏道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革新主張，詩壇的風氣才有所改變。北山著書解說詩歌諸體，抨擊詩歌的擬古之風，大段地摘譯了袁宏道的詩論，提倡清新詩說，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直接影響是李攀龍、王世貞的市場逐漸縮小，袁宏道的性靈說卻成了詩壇的旗幟。

江戶初期，思想文化界受朱子學說的影響，普遍輕視通俗文學，直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人文主義思

潮興起，才響起了發展町人（工商業者）文學的呼聲。此時，中日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白話小說陸續傳入日本，正適應了日本廣大町人的迫切需求。傳入日本的白話小說品類繁多，包括《三國志演義》、《忠義水滸傳》、《金瓶梅》、《三言兩拍》等許多歷史演義小說、公案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這些小說在日本廣為流傳，不少被改寫、改編成以日本為背景，以日本的歷史或現實生活中人物為主角的讀物。對中國白話小說的研究和批評也熱鬧地開展起來。⁷

六、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時代的日本漢學

1854年，美國用武力強迫日本打開門戶；江戶幕府相繼與美、英、荷、俄、法等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引發了農民暴動和市民起義。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運動迅速展開，不久，幕府統治完全陷於癱瘓。將軍德川慶喜被迫把政權交還給明治天皇睦仁，此後天皇政府進行一系列資產階級性的改革，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開始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一）維新派學者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明治維新發動之初，維新派人士為討幕削藩，使政權回歸天皇，曾利用朱熹主張的「大義名分」說來鼓吹「尊王大義」、「王政復古」，漢學還有一定利用價值，然而當倒幕削藩一旦成功，維新派欲把日本引向「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之路時，以打擊漢學為主的傳統文化和導入西洋文化為主的近代文化運動，就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維新派人士的鼓動下，向歐美學習的情況已到如癡如狂的地步，穿西服、吃西餐、跳洋舞，一切向西洋看齊。為了全盤西化，徹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當時，幾乎一切主張維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本國的儒學，因為他們深知，日

6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間的復古文學主義代表人物，有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等7人。
後七子：明嘉靖年間的擬古文學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有王世貞、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人。

7 江戶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明清小說評論）：都賀庭鍾（1718-1794年）、上田秋成（1734-1809年）、曲亭馬琴（1767-1848年）。

本的傳統價值觀念是與儒學密切相關，而且，幕藩體制雖說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但畢竟是建立在儒學思想基礎上的，只有集中力量批判儒學，動搖儒學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才可能實現日本的觀念變革，才有可能在日本人內心深處滌蕩幕藩體制的殘餘，順利地向歐洲體制過渡。於是有日本近代哲學開創者之一的西周和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學者津田真道對儒學抨擊在先，再有被稱為「東方盧梭」的中江兆民對傳統儒學的批判，然後便是福澤諭吉對儒學的全面「清算」。⁸但是維新運動的深入，使得民權運動發展到了威懾皇權的地步，於是，在天皇制政體的支持下，又有了儒學的復甦。不過總的說來，隨著傳統漢學勢力的逐步削弱，漸漸地，日本人就只是從學術上研究中國文化，而不再把研究對象作為自我意識形態或社會意識形態，不再以中國儒學的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標準作為修身、齊家、治國的主要標準了。

（二）明治時代日本儒學的復甦

日本的維新派成分是很複雜的，所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一批擁護皇權主義的知識分子，想在維新中謀求鞏固皇權；一批擁護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則指望在維新中，實現民權、民主和個人自由，他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們之間的衝突日漸激烈時，天皇制政體的儒學觀開始發生了變化。

1. 《教學大旨》和《教育敕語》的頒發

1878年，明治天皇親政，親政後的首要任務便是加強天皇制政體的力量，打擊、壓制自由民權運動。這時他意識到了儒學「仁義忠孝」教諭的重要性，於是又把它重新舉起來，作為加強皇權的思想武器。1879年，明治天皇的教師儒學家元田永孚（1818-1891年）以筆記天皇意見的形式草擬了《教學大旨》，並以天皇的名義頒發。《教學大旨》說：

聖旨 教學之要，在於明仁義忠孝，究知識才藝，以盡人道。此所以我祖訓國典之大旨，上下

一般之教也。晚近專尚知識才藝，馳文明開化之末，破品行，傷風俗者甚眾。然所以如是者，則維新之始，首破陋習，向世界尋知識以廣卓見，雖一時取西洋之長，奏日新之效，然徒以洋風是競，恐於將來，終不知君反父子之義亦不可測，此非吾邦教學之本意也。故自今之後，基於祖宗之訓典，專以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人人尚誠實之品行。然此，各科之學，隨其才器，益益長進，道德才藝，本末具備。大中至正之教學，布滿天下，則吾邦獨立之精神，可無愧於宇內。⁹

這一篇《教學大旨》頗有中國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味道，但這裏強調「基於祖宗之訓典，專以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是為鞏固皇權，以傳統儒學為思想武器，壓抑已經開始威脅皇權的民權運動，並不想恢復江戶時期傳統儒學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儒學在中國作為封建專制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歷史極為久遠，事實證明，儒學與專制統治是有契合之處的，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天皇政體對儒學態度的這種變化，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

1890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教育敕語》，這是日本在近代化中以儒學為理論支柱和思想武器，來實施皇權主義的綱領。《教育敕語》說：

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望爾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擴大公益，開展世務，常重國憲、尊國法，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僅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揚爾祖先之遺風焉。斯道實為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通於古今而不謬，施於內外而不悖者也。朕庶幾與爾臣民，共同拳拳服膺，

8 對傳統儒學批判的維新派學者：西周（1829-1897年）、津田真道（1829-1903年）、中江兆民（1847-1901年）、福澤諭吉（1834-1901年）。

9 《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30《明治思想集》（1）（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

成一其德。¹⁰

《教育敕語》表現出天皇制政權欲將儒學與日本國粹主義結合的意圖。

2. 明治時代儒學的復甦

明治儒學的復甦是以恢復道德作為旗幟的。1876年，原「明六社」（1873年創社）成員西村茂樹創立「修身學舍」後又改名為「日本弘道會」。「日本弘道會」一詞出自《論語·衛靈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語，意為：人能使道發揚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擴大。創立「日本弘道會」的目的，是「在於提高國人之道德，以鞏固國家之基礎」。那麼道德的內涵是什麼呢？顯然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是「忠孝廉恥」等明治初年被維新學者嘲笑和猛烈抨擊過的東西。自1881年起，日本開始恢復停止了很久的「孔子祭」，最早恢復孔子祭的是關東的足利學校，其後，從1907年起，東京湯島聖堂便每年舉行一次「孔子祭」，一直到1944年，一共舉行了38屆，「孔子祭」的舉行是儒學復甦的一個重要標誌。1877年10月，明治時代以弘揚儒學為宗旨的一所學校——二松學舍成立了，這是一所培養傳統漢學家為根本任務的學校，創立者為三島毅（1830-1919年）。「二松學舍」開設的課程幾乎全是中國典籍，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書經》、《易經》、《詩經》、《孝經》、《近思錄》、《傳習錄》等等。1923年，又一所培養傳統漢學家的學校——大東文化學院成立，並在財政上經常獲得天皇的「賜金」。1880年，「斯文學會」成立，首任會長是皇子有栖川宮，該學會成立的宗旨是「深慮國家之前途，欲以儒學而養成堅實之思想，以鞏固國家之基礎」，該學會的具體任務有三：一為創辦學校，二為舉辦講座，三為出版著述。講座於1881年3月起舉行，講題為《易經》、《書經》、《詩經》、《論語》、《孟子》等。

儘管又是辦學校，又是成立學會，又是祭孔，又是出版著述，似乎很熱鬧，但是要把儒學重新鑄造成日本的自我意識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已經是不可能了，經

過明治初年的巨大衝擊，日本人已經不可能像江戶時代那樣，把儒家的價值觀念作為他們修身、齊家、治國的主要標準了。儒學復甦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草擬《教學大旨》的元田永孚外，還有西村茂樹（1828-1902年）和服部宇之吉（1867-1939年）。

七、明治、大正時代

（一）中國文學研究

明治維新後，在西方思想像洪水般湧入日本，沖刷著日本社會各個角落時，卻出現了漢詩文的興盛，正是由於明治時代傳統儒學的衰落，解除了儒學對詩歌創作的束縛，才出現了漢詩寫作多姿多彩的局面。對中國戲曲小說的研究，由於歐洲近代文藝觀念的導入，擺脫了李漁¹¹以「義發勸懲」為小說創作主旨的小說觀的影響，開始以是否描寫世間真情實態為作品評論標準，實現了對中國古代文學從仰慕、摹擬到參照研究乃至批評的轉變。

明治時代初期，漢詩十分繁榮興盛，而日本傳統的詩歌「和歌」卻相當沉寂，出現了所謂「和歌下落，漢詩騰貴」的局面，僅明治初年出版的漢詩選本便有《明治三十八家絕句》、《東京才人絕句》、《舊雨詩鈔》、《明治十家絕句》、《今世名家詩抄》、《明治名家詩選》、《明治百二十家絕句》等多部。明治初年漢詩作家與漢詩研究學者常常是兩位一體的，一身而兩任，研究漢詩是為了寫作，寫作又推動了研究。自1877至1897年這20年稱之為「漢詩全盛時代」，那時的漢詩人除了個人創作之外還組織詩會和詩社，詩會多為飲宴，因而常在酒館舉行，先由對中國古典詩歌素有研究者講解中國古典詩歌名篇，然後擺上酒來，司儀出示詩題，與會者邊作詩邊飲酒，最後品評，分出等次。明治年間漢詩社甚多，明治初年有「舊雨社」、「茉莉詩社」、「下谷吟社」、「麗澤社」等，明治中後期，以森槐南（1863-1911年）為盟主的「星社」影響最大。森槐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漢學家，曾研究漢字音韻，兼及明

¹⁰ 《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31《明治思想集》（2）（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

¹¹ 李漁（1611-1680年），通俗小說和戲曲家，著有《肉蒲團》。

清小說，又首開研究中國戲曲的風氣，他著有《韓昌黎詩講義》、《杜詩講義》、《古詩平仄論》、《唐詩選評釋》等著作，還團結了不少青年漢詩人，影響很大。為什麼明治時代會出現漢詩繁榮、興盛的現象呢？一是明治初年，在西方近代思潮的衝擊下，儒學衰落，儒學對詩歌創作的限制大大放鬆，「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完全被扔在一邊，詩歌不再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因而，擴大了題材，內容變得多姿多彩，情感的抒發也自由了，這樣寫的人多了，讀的人也與之增多。二是因為中國的詩歌理論強調創作與時代政治的密切關係。中國歷代大詩人多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並用詩歌來表達憂國傷時的情懷。明治維新期間漢詩人面對國家政治局勢巨變，思想文化領域雲翻雨覆，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人民生活的禍福，感慨良多，這種感時傷世的情感，如用日本傳統的詩歌形式和歌來表現，便非常困難，因為和歌表現歷來是花鳥風月的纖微意趣，山光水色前的興致所至，愛情生活中的細膩情感，歌人從來不詠唱自己政治風濤中的浮沉和國家民族命運的興衰，因而明治時代詩人的複雜情感在日本新詩體誕生以前，也只能以漢詩來表達。另外，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也輩出：坪內逍遙（1859-1935年）、古城貞吉（1866-1949年）、森槐南、兒島獻吉郎（1866-1931年）、狩野直喜（1868-1947年）。

（二）中國史研究

在文字學和史學研究方面，由於甲骨文字的發現並傳入日本，日本學界開始了對甲骨文字的學科研究，羅振玉和王國維東渡日本，在日本從事甲骨文研究，贏得了日本學者的廣泛崇敬。

甲骨文的發現是20世紀初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給學術界巨大震動。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得知中國發現了甲骨文的國家，劉鶚的《鐵雲藏龜》尚未出版時，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就造訪了劉宅，親眼目睹了第一批甲骨文字片，他是見到甲骨文的第一個外國人，此後甲骨逐漸流入日本。1909年，日本林泰輔博士發表了題為〈論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牛骨〉的論文，這是日本學術界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有關甲骨文的論文，題目中說的湯陰縣應為安陽縣，甲骨文發現後，古董商人欺騙收藏家，把出土地址故意說成湯陰縣，真正的出土地點為羅

振玉所查實。羅振玉是中國甲骨學的奠基者，1910年，羅作《殷墟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1918年，林泰輔前往中國，到安陽進行了實地調查，搜集了若干甲骨，其間和羅振玉及羅振玉最重要的弟子王國維多有往來，他們的交往對以後中日兩國甲骨文研究的開展，有相當影響。1919年，林泰輔發表了〈殷墟遺物研究〉和〈龜甲獸骨中所見地名〉等論文，1921年，刊行《龜甲獸骨文字》2卷。此外還有《龜甲獸骨文字表》共6冊，當時未出版。自此，日本的漢學家們開始接受中國存在甲骨文的事實，並開始搜集甲骨片，展開了甲骨文研究，這對日本近代漢文化研究的實證主義觀念和方法的形成和發展，是有重大推動作用的，這方面林泰輔的功績是無庸置疑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和王國維赴日本避難，攜帶了許多甲骨文字片和書籍，在京都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活動。羅振玉完成了《殷墟書契前編》（1912）、《殷墟書契精華》（1914）等著作，又與王國維合作完成了《殷墟書契考釋》（1914）、《流沙墜簡》（1914）等著作。在大量甲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王國維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國古史研究，1915年王國維在日本以骨片為依據，採用實證主義方法所作的甲骨文研究，給了日本學者很大啓示，撰寫成《三代地理小記》。1916年，內藤湖南發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論文〈王亥〉，1918年林泰輔發表〈龜甲獸骨文中所見之地名〉，這樣，以甲骨文作為古史新證的研究便逐漸在日本學術界開展起來。王國維的《三代地理小記》為古史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那就是古史研究應該建築在實證基礎上，此種實證又必須是古代文獻與底下文物相互參證的。這一點對日本漢學研究學者啓發很大，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等就是在這一思路影響下從事中國古史研究的。¹²

八、昭和時代日本的中國學

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這一年的3月15日警察對全國勞動團體、政黨進行突然搜查，取締勞工黨團，揭開了充滿血腥氣的昭和史的序幕。1897年成立的日本

¹² 中國史研究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年）、白鳥庫吉（1865-1942年）、內藤湖南（1866-1934年）。

最早的勞工組織「勞動組合期成會」，1900年成立的以安部磯雄、片山潛爲首的「社會主義協會」，1919年河上肇創刊的《社會問題研究》等進步報刊，都先後被取締查禁。在對社會主義思想民主運動嚴厲鎮壓的同時，軍國主義思想卻得到了扶植和提倡，一些法西斯主義思想家被競相吹捧，其中突出的是北一輝（1883-1937年）和大川周明（1886-1957年）。北一輝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是《日本改造法案》。《日本改造法案》具有明顯的法西斯主義特徵：首先是狂熱的皇權論，鼓吹天皇是「國民之總代表，國家之根柱」，「是把三千年之生命與六千萬人作爲一人格的具體化之皇帝」；再者便是提倡國內極權主義、國外擴張主義，他公然說：「民約論是幼稚時代的思想」、「選舉制是低能哲學」，要求立即發布戒嚴令，中止憲法，解散議會，禁止罷工。他公然宣稱，爲了日本的利益「不得不尋求大領土」，還說：「我日本由於五十年間將有二倍的人口增長率，百年後至少養育二億四、五千萬人口，不能不尋求大領土。」他不是論說把對象國變成殖民地的合理性，而是論說從西方帝國主義手中爭奪殖民地的合理性，他說：「英國乃跨越全世界之大豪富，俄國則是地球北方大地主，以星星諸島作爲國境線之日本，於國際上則處於無產者之地位，豈無堂堂正正之名，向彼等開戰以奪取其獨占之權利乎？」以後大川周明等把日本從西方列強手中搶奪殖民地，稱爲「解放亞洲」、「促進舊歐洲革命」就本於此。大川周明是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戰後遠東國際法庭宣判他爲「甲級戰犯」，但因其精神失常而未被處刑。大川周明揚言以「堯舜之道」來「重建支那，是皇國曠古的聖業」，具體目標是「確認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在中國「建立起王道樂土的新國家」。他說：「合併是使支那和日本置於同樣的政治體制之下，依靠『謹奉皇天之神意，使衣食豐足而安黎民』」的辦法，實行萬世人君模範的堯舜之道。很明顯，所謂「重建支那」就是「合併支那」，把中國「和日本置於同樣的政治體制下」。他還把中國的抗日鬥爭稱爲「內亂」，聲稱「只有刻不容緩地平定這一內亂，才能期望大東亞戰爭的完結」。他公然揚言稱霸世界

「實現世界維新」，並說：「把日本、滿洲、支那共同化的廣闊的經濟圈加以鞏固。以此爲基礎而實現從東南亞開始到印度和中亞的解放」，他聲稱「必須在中東與英國決鬥，在太平洋上與美國爭雄，打敗兩強，實現世界維新」。這種理論在軍國主義野心的驅動下形成，形成後又反過來推動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膨脹。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出兵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發動了對中國侵略戰爭。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對中國發動全面進攻，中國的八年抗戰開始了。這個時期的日本漢學研究機構大多和日本政府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擴張政策有著密切關係，如1929年4月成立的東方文化學院就直接隸屬於外務省，1939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立，東京大學校長在敘述成立理由時說：「現今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鞏固東洋永遠和平之基礎已爲我國固定之方針，特此之際，東洋文化的徹底攻研，對於我國策之實行，誠爲緊迫之要務。」¹³該所當時的所長桑田芳藏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一冊）·序》中說道：「本研究所對以東亞爲中心的廣大亞洲大陸、南洋的文化進行綜合性的根本研究，以求對國運進展和學術發展作出貢獻。今正當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際，東洋文化的研究可謂當務之急。」

這裏不能不提到「滿鐵地理歷史調查部」，這個機構是所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下屬機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於1907年4月1日開業，一開始它就不是一個單純的鐵道公司，而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時的指揮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便成爲日本對遠東戰略的參謀部，而這個「調查部」所從事的所謂學術研究，就完全是爲日本侵略戰爭服務的，其作業是在對滿洲進行廣泛實地調查並整理史料的基礎上，論證「滿洲獨立的意義」，研究出掠奪滿洲、霸佔滿洲的方案。這個時期的日本漢學家，專治學問而不爲日本軍國主義政策服務的學者當然爲數不少，但是充當日本軍國主義奴僕的也大有人在。

戰後，在美軍管轄時期，經濟一時尚未能復甦，各種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體的活動都停止了，日本漢學界的論文和著作都很有限，但是在戰前、戰時處於被壓制狀

13 《東京大學百年史》通史2，引用1941年度《秘（密文）書》。

態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學者，卻有了發表自我見解的可能。這個時期岩波書店出版的新書中就包括《三民主義和現代中國》、《中國革命的思想》、《社會主義入門》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書。社會主義思想、歷史唯物論的傳播，對於日本漢學界研究視點的轉換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有著相當大的作用。戰後，原來從事中日友好運動的學者，可以較公開地開展活動，有代表性的學者，如仁井田升、貝塚茂樹等都對中日友好的推進作出了努力，他們的中國觀也隨著時代的變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55 年以來，日本經濟復甦，隨著經濟力量的增強，學術團體和學術性刊物開始正常活動，出現了學術和政治分離、學術研究多元化的情況，這和 1954 年頒布的「關於義務教育各學校中確保教育政治中立的臨時措施法」有密切關係。日本學校裏的教育和學術研究，在戰前、戰時是和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時從法律上明確了學校教育及學術研究與政治分離的原則，這對日本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漢學界也不例外。

這一時期日本漢學界和中國漢學界的聯繫也有所加強，1955 年，以郭沫若為首的中國史學訪問團訪日，就中國的歷史分期問題和日本史學界進行了交流，對於日本漢學研究有一定影響，從此一度完全中斷的中日學術交流開始恢復，並在學術領域內互有影響。日本的戰後漢學研究就在這樣的時代特徵中開展起來。¹⁴

九、戰後的漢學研究

自 1945 年日本戰敗到 50 年代末，這個時期日本在中國哲學研究上處於調整階段，原因是在占領軍的支持下，學界對作為軍國主義思想支柱的「東洋思想」進行了批判，而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要擺脫「東洋思想」的

影響，從純學術的角度對中國哲學進行更理性的探討，還需假以時日。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研究，則主要是對戰前史學的反省，對戰爭時期史學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檢討和轉換。在文學研究領域，由於文學和文學研究不再是「東洋學」、「支那學」的附庸，而變得熱鬧起來。60 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從復甦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期，在校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大幅度增加，1965 年，日本的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 100 萬人，這個時期，由於中日友好運動的發展，大學裏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的教學也有了相當的增加，1977 年，日本從事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教學以及中國問題研究的教授、副教授、專任研究員已達到 3,000~3,500 人左右。這個時期日本漢學的特點是，通過對戰前漢學的批判，把漢學作為政府政策附庸的情況已經改變，學術研究和政治脫離的趨勢日見明顯。漢學研究的分工逐漸細密，過去那種一位大師兼通各個研究領域的情況，正在改變，往往是一位學者集中一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而在他的周圍形成一個研究團體，由許多這樣的學術團體支撐日本的漢學界。綜合性的研究、共同研究逐漸增加，由於交通狀況大為改善，新幹線通車，學者們之間交流日見密切，共同研究大為增加。與此相關，研究成果出現了大型化的趨勢，系列化的研究叢書、大型字典、索引等工具書陸續出版。¹⁵

十、結語

日本自中國漢代以降已接觸中國文化，並長期不斷且大量攝取、學習與模仿，所謂日本漢（文）學歷經長年的發展，至日本近世（江戶時代）算是達到了最高潮，這是學界一致公認的事實。於日本江戶時代，在所有的領域幾乎都以漢文來著述，因此當時有為數眾多的

14 戰前和戰時的漢學研究：1. 中國哲學研究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 年）、武內義雄（1886-1966 年）、中江醜吉（1889-1942 年）；2. 中國史學研究學者：桑原隲藏（1870-1931 年）、藤田豐八（1869-1928 年）、矢野仁一（1872-1970 年）；3. 中國文學研究學者：久保天隨（1875-1935 年）、鹽谷溫（1878-1962 年）、鈴木虎雄（1878-1963 年）、青木正兒（1887-1964 年）、新居格（1888-1951 年）、竹內好（1908-1977 年）。

15 戰後的漢學研究：1. 中國哲學研究學者：加藤常賢（1894-1978 年）、木村英一（1906-1981 年）、赤塚忠（1913-1983 年）、西順藏（1914-1984 年）、森三樹三郎（1909-1986 年）、岡田武彥（1908-）；2. 中國史學研究學者：仁井田升（1904-1966 年）、宮崎市定（1901-1995 年）、貝塚茂樹（1904-1987 年）；3. 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 年）、神田喜一郎（1897-1984 年）、小川環樹（1910-1993 年）、目加田誠（1904-1994 年）；4. 漢語研究學者：諸橋轍次（1883-1982 年）、白川靜（1910-）、藤堂明保（1915-1985 年）。

漢文書籍（中國書籍）的翻印本，以及許多優秀的注釋書或準漢文書籍的再編本公開刊行，其中包含很多，日後變成傳播明治維新革命原動力的海外情資的漢文書籍，以及漢譯洋書。

但很諷刺的是，當傳播海外情資的漢文書籍和漢譯洋書的力量實現維新革命之後，隨著歐美先進國家邁向近代化，洋學逐漸變強勢、受重視的強烈影響之下，日本人對於漢學漢文的關心卻反而急速衰退。衆所周知，明治初期在相關學校教育的主導權上，漢學、國學、洋學三派還曾有過激烈的競爭，但曾幾何時，在「和魂洋才」這塊光鮮的招牌下，隨著時代巨輪的推進，擔當倫理道德教育的漢學優勢已被推向劣勢。向來支撐日本傳統學術、文化的日本漢（文）學已深陷危機四起的地步，日本漢學家們皆懷抱著深刻的危機感。再加上近年來電腦及資訊科技機器的普及，一般人對漢字的疏離情況更顯著，就連執教於中學、高中的漢文教師程度也低落，可說是一代不如一代，導致日本當前在漢字漢文的理解力和讀解力上，已陷入空前的悲劇狀態。

今後為改善日本漢（文）學研究的頹勢現狀，在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於 2004 年受日本文部科學省 21 世紀 COE 計畫「革新性的學術分野」所採納的「日本漢文學研究的世界據點構築」計畫方案中，二松學舍大學佐藤保理事長曾於「第四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¹⁶的「日本漢學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專題演講中，提出以下四點作為「日本漢文學研究的世界據點構築」此項頂尖計畫的事業支柱：1. 調查日本漢文文獻的所在並建置其資料庫；2. 確立研究者間交流的聯絡網並進行共同研究；3. 培養年輕研究者及書誌性調查的專家；4. 漢

文教育的研究及振興。

佐藤保特別於上述演講的最後，舉出李慶在《日本漢學史・第一部・起源和確立》¹⁷的「前言」中所指出的近代日本漢學六大特色：

1. 縱觀近代的日本漢學，在各個時期，都有相當的部分受到政治思想的左右。
2. 日本的漢學研究，就其主流而言，非常重視資料。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注重語言能力的養成，講究對原著的解讀；二是有著注重利用日本所藏，用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有資料來進行研究的特點；三是對新發現的資料的熱忱和關注，尤其是對出土考古的文物，學界反應之快，其他國家的學者也很難望其項背。
3. 近代日本漢學，受西方漢學界觀點左右的情況屢見不鮮。
4. 近代日本漢學者，往往在一個具體問題上，充分收集資料，加以研究。
5. 對工具書和基礎工作的重視。這不僅是日本漢學的特點，也可以說是日本漢學的傳統。
6. 近代的日本漢學，有著非常明顯的地區或者說區域特色。如著名的有所謂「東京」和「京都」派的區別。

佐藤保以此作為結束。他雖沒有明白表示引用此近代日本漢學六大特色的用意，卻可以從他講稿的字裡行間體會出他內心的著急，彷彿想以此當作自我激勵與警惕，並高聲向現在的日本漢學研究界呼籲，應更積極發揚昔日光輝，早日重新構築出日本漢學研究的新光景。

16 佐藤保，〈日本漢學研究的現狀與課題——二松學舍大學 21 世紀 COE 計畫的目標〉（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第四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日本漢學中的研究方法，2005 年 5 月 6 日。）

17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一部・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 月），頁 8-10。